
國際戰略大格局的演變

朱鋒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高度發展的今天，國家之間相互依賴的程度日益加深，每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選擇和致力於和平、繁榮的努力都不可避免地深刻而又廣泛地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關於當前國際局勢和戰略格局的整體特點，2020年10月26日至29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深入分析了我國發展環境面臨的深刻複雜變化，認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然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深入人心”；但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敏銳地指出，“國際環境日趨複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¹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對當前世界大格局的概括和描述生動、準確和及時，為中國如何在變動的世界大格局中把握自己、塑造環境、提升實力和堅持不懈地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提供了思想和理論上的堅實保證。

一、國際戰略大格局的含義

“國際戰略大格局”是明顯帶有中國色彩和烙印的用語，展示了判斷、認

1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在京舉行》，《人民日報》2020年10月30日。

識和甄別國際環境問題時具有戰略高度、全局視野和抓住國際形勢中心問題點的“中國視角”。在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對類似問題的認識和分析往往使用的是“國際體系”“國際秩序”或者“國際情勢”等用語。

從國際關係的專業視角來看，“格局”的主要含義是結構、模式，比如，指代力量對比結構的“國際格局”。然而，與“國際格局”有所不同，本書的中心概念——“國際戰略大格局”的基本性質並非某種結構，而是一種“安排”，從這個意義層面來看，“國際戰略大格局”與“國際秩序”的含義更加接近一些。從一定程度上來看，“國際戰略大格局”等同於“國際秩序”。然而，本書之所以選擇“國際戰略大格局”而非“國際秩序”作為本書的中心概念，原因就在於，“國際戰略大格局”概念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較為深刻，反映了中國人特有的觀察和認識國際事務的方式方法，提供了一種探究國際問題的中國視角。

早在冷戰結束初期，1993年國內有研究人員指出：“所謂國際戰略格局，是指在世界範圍內充當主要角色的各個行為主體經過分化、組合及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一種結構和力量配置狀況。”¹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國際戰略格局的形成過程中，主要大國之間的“相互作用”產生了不可或缺的推動力量，而這正是“國際秩序”建立或變革所需的必要條件。國內學者對國際戰略格局的認識豐富多彩。同濟大學軍事教研室主任張國清認為：“國際戰略格局，是指對國際事務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力量，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相互聯繫、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較為穩定的力量結構。”²“國際戰略格局”包括“力量結構”，但是並不單純是一種由國際體系當中主要大國之間的力量對比所形成的“結構”。值得注意的是，在國際戰略大格局當中，主要大國存在“相互聯繫”和“相互作用”，主要大國之間的這種“互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形成乃至改變國際秩序。從這個層面來看，“國際戰略大格局”也包含了“國際秩序”以及在特定國際秩序下國家之間互動的主要方式。具體來說，國際戰略大格局就是國際體系當中主

1 劉文祥：《從“中間地帶”到“三個世界”——探析毛澤東的國際戰略格局思想》，《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6期。

2 張國清：《試論當代國際戰略格局多極化發展趨勢》，《軍事歷史研究》2009年第2期。

要大國通過“互動”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主要大國之間戰略力量的對比和在力量對比基礎上的國際體系內有關衝突、合作、治理機制和國家總體關係特徵在內的現有狀態。國際戰略格局的演變常常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和衝擊，如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了國際戰略大格局。

二、新冠肺炎疫情與國際戰略大格局

2020 年初，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開始悄然改變世界的面貌，影響了國際關係的發展進程，繼而影響到國際戰略大格局的發展和演變。習近平總書記深刻地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這個大變局加速演進，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國際經濟、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發生深刻調整，世界進入動盪變革期。”¹ 從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當中我們可以認識到，新冠肺炎疫情對於世界的衝擊可謂是前所未有的，它在很大程度上發揮了類似化學反應中“催化劑”的作用，促進了國際戰略大格局的演變。

新冠肺炎疫情國際化是其在本質上作為一種全球性問題的外在表現。新冠肺炎疫情作為跨國性傳染病是各國必須共同面對的挑戰。在當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時代，雖然全球化的發展進程時有停滯，但是我們應該清晰意識到：全球化的總體發展趨勢不可阻擋。這決定了國際社會各國需要正視伴隨全球化浪潮而來的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在內的全球性問題。

全球性問題所具有的顯著特點之一就是跨國性，僅憑一國之力難以有效解決全球性問題。全球性問題的本質特性促使體系大國需要通過合作的方式共同應對和解決。周方銀認為，國際秩序演變的重要內在機制之一就是“國家對於其他國家的行為方式預期方面的重要變化”²。借鑒周方銀的這一觀點，我們認

1 習近平：《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 40 週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0 年 10 月 15 日。

2 周方銀：《國際秩序變化原理與奮發有為策略》，《國際政治科學》2016 年第 1 期。

為，從理論上看，新冠肺炎疫情對國際戰略大格局的影響是：它促使體系大國在“互動”和“相互作用”的過程當中傾向於選擇與其他大國進行戰略合作的行為方式，並且產生一種重要的預期——認定其他大國也會作出同樣的戰略選擇。由此，新冠肺炎疫情對國際戰略大格局的發展和演變產生了作用和影響力。

新冠肺炎疫情國際化表明病毒性傳染病是人類從古至今的共同敵人，它也是對世界經濟與和平生活方式的重大威脅，更是需要各國加強合作、攜手應對的重大挑戰。新冠肺炎疫情的管控和最終克服，不僅是中國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不僅是中國的責任，也是國際社會共同的責任。新冠肺炎疫情本質上作為一種全球性問題，是國際社會各國的共同挑戰，同時也是全人類的共同挑戰，這需要體系大國在“互動”和“相互作用”的過程當中將大國合作作為戰略選項。這不僅是國際社會抗擊和戰勝新冠肺炎疫情的共同需要，更是人類面對危機時世界各主要國家需要展示的大國責任。

伴隨着全球化進程的推進，各種全球性問題亟待解決，從而引出全球治理的問題。新冠肺炎疫情是目前國際社會所面臨的非常迫切的現實問題，由前文的論述我們可以知道，全球範圍內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和解決需要體系大國選擇戰略合作的行為方式，但是，在具體的合作行為當中，各國採取何種合作方式來分擔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治理的責任，是當前國際戰略大格局的發展和演變的關鍵變量。

在當前國際社會，主權平等仍然是居於核心位置的國際規範，主權規範正在深刻地影響着各國的行為方式：主權規範要求各國不論大小強弱都是平等的，各國都應該在國際事務當中擁有相同的權力，並且承擔起相同的責任。然而，在全球治理領域，主權平等原則無法適用，原因在於各國在實際力量方面存在着巨大差距，一般而言，小國或者弱國缺乏必要的經濟和軍事力量來參與全球治理進程並且承擔相應的全球治理責任，因此，全球治理的責任主要由體系大國來分擔。而體系大國在全球治理責任分擔問題上所採取的不同原則或者說遵循的不同國際規範也會對國際戰略大格局的發展和演變造成不同的作用和

影響。¹

新冠肺炎疫情將給今後的世界政治和經濟局勢帶來重大改變。但改變的方式，並不是新冠病毒，而是各個國家尤其是深受疫情侵害的主要國家的抗疫理念和行動。新冠肺炎疫情通過改變各國的認知、觀念、預期以及行為方式，從而影響國際戰略大格局的發展和演變。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國際戰略大格局演變的路徑有兩條：其一，在觀念層面上，改變體系大國的認知、價值觀念，以及對於其他體系大國行為方式的預期；其二，在實踐的層面上，直接影響和改變體系大國的行為方式。

中國、美國是現行國際秩序當中至關重要的兩個大國，中美關係對現行國際秩序的存續與否從某種程度上說具有決定性作用。中美兩國的“互動”和“相互作用”對國際戰略大格局的發展和演變同樣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力。然而，在近期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問題的全球治理實踐當中，從觀念的層面來看，中美兩國尚未在新冠肺炎疫情治理的問題上達成戰略性共識，反而存在較大分歧，這導致中美兩國圍繞新冠肺炎疫情治理問題無法在戰略上實現有效合作，遑論進一步探討新冠肺炎疫情治理責任如何分擔的問題。這些局面不利於現行國際秩序的穩定性和延續，甚至有可能造成現行國際秩序的“失序”，乃至走向崩潰。從實踐的層面來看，美國的行為方式並未從“大國競爭”當中擺脫出來，致使“中美戰略競爭”仍然沒有讓位於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共同治理。這同樣不利於維護現行國際秩序的穩定，並且對國際戰略大格局的演變造成相應的影響。

中國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始終呼籲全球共同協作，堅持倡導多邊合作，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實際體現。與之相反，特朗普政府沒有採納多邊主義，而是堅持單邊主義行動。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為新冠肺炎疫情治理所提倡的“理念”，以及中國行為方式背後所體現的原則，符合現行國際秩序的基本規範和規則，有助於維護現行國際秩序，保持現行國際秩序的穩定，避免現行國際秩序由於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而處於失序的狀態，因此，筆者認為，

1 閻學通教授對國際秩序當中“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規範進行了分析。參見閻學通：《無序體系中的國際秩序》，《國際政治科學》2016年第1期。

中國並非所謂的“修正主義國家”，而是現行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和“建設者”。與中國不同，作為現行國際秩序的主導國，美國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治理進程當中並未承擔起與其國際“身份”相對應的國際責任。美國掌握着非常大的國際權力，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治理進程當中，並沒有發揮與其巨大權力相稱的作用和影響力。事實上，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國優先”的原則，把美國的國家利益置於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之上，視美國利益的需要來選擇是否退出國際組織和機構，放棄了歷屆美國政府一貫堅持的自由國際主義原則。在這樣的政策背景之下，美國政府在政策行為方式上選擇了單邊主義，放棄了多邊主義。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是所謂的“修正主義國家”，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破壞者。

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治理也構成了重大挑戰，對此，習近平主席指出：“我們要致力於推進合作共治的共同開放。面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挑戰，不應該任由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破壞國際秩序和國際規則，而要以建設性姿態改革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更好趨利避害。要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維護以世界貿易組織為基石的多邊貿易體制，完善全球經濟治理規則，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¹ 習近平主席的這番講話充分闡釋了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後疫情時代的全球經濟治理進程當中所堅持的合理的立場和原則。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戰略論斷的生動體現。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傳播，造成了全球公共衛生和健康危機。疫情在世界各地暴發所導致的居家隔離、封城等抗疫措施的實施，造成了全球經濟的顯著衰退，激化了社會矛盾，影響國家政權的穩定，並在部分地區造成了地緣政治新的對立和衝突。新冠肺炎疫情對於國際秩序的影響涉及很多方面，包括國際安全、經濟、政治，可以說，新冠肺炎疫情對於國際秩序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國家建立國際秩序的根本目的是，通過國際制度進行多邊合作，在最大程度上實現各國最大的共同利益。因此，多邊主義是當前國際秩序的基本原則之一，是國家在國際秩序當中尋求合作的基本行為方式。全球性問題，如新冠肺炎疫情的解決，需

1 習近平：《在第三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人民日報》2020年11月。

要各國進行多邊主義的合作。

2020年8月29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巴黎同法國外長勒德里昂舉行會談時表示，此次歐洲之行，與各國達成的最大共識就是要堅持多邊主義。多邊主義是絕大多數國家特別是中小國家的安身立命之本。當前，單邊主義不斷抬頭，一些國家無視國際協議，拒絕履行國際義務。如果沒有多邊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建立的多邊主義機制和國際秩序將受到嚴重破壞，中小國家將遭受到巨大衝擊。在此形勢下，中法作為負責任大國，應積極倡導踐行多邊主義。一要坚持多邊理念。雙方應利用各種場合積極倡導多邊主義，抵制單邊主義行徑，讓堅持多邊主義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二要採取多邊行動。中方支持法方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繼續發揮領先作用。中方已提前實現2020年減排目標，正積極研究下一步計劃。雙方要相互支持辦好2021年昆明《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和馬賽世界自然保護大會。三要遵守多邊協議。到處“退群毀約”等單邊主義行徑不得人心。中法應在國際事務中加強協調合作，維護好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等國際協議和多邊外交重要成果。四要強化多邊機構。聯合國是支持和踐行多邊主義最重要的平台，雙方應支持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應有的核心作用。¹

中法兩個體系大國在倡導多邊主義的價值觀念以及堅持多邊主義的行為方式方面達成了重要共識，這無疑有助於維護國際秩序和國際戰略大格局的穩定。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這兩個層面，中法兩國的共識還涉及多邊主義的協議和機構層面。這賦予了多邊主義更加完整的意義和內涵，使得多邊主義接近一個完整的體系：多邊主義不僅僅是我們一般所理解的作為國際秩序基本規範的一種理念，事實上，我們看到，中法兩國通過實踐已經把多邊主義的理念轉化成具體的國際行為，發揮出了中法兩國作為體系大國對於國際事務應該具有的影響力。因此，從多邊主義的角度來看，中法兩國倡導踐行多邊主義對於國際秩序和國際戰略大格局的意義就是：促進了除主導國美國以外的其他體系大國作為重要的戰略力量的地位提升，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促

1 《王毅提出倡導踐行多邊主義的四點主張》，新華網 2020年8月30日。

使“全球力量的分配”趨於相對而言較為“均衡”的狀態，促使“國際力量的對比”趨於相對平衡，這有助於限制美國單邊主義國際行為，降低美國“退群毀約”對國際秩序造成的消極影響。

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治理進程當中，中國提倡的諸如“多邊主義”“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價值觀念，以及中國遵循這些合理的價值觀念表現出來的行為方式會得到國際社會大部分國家的認同和支持，這能夠促進中國作為一支重要的戰略力量在國際戰略大格局當中相對於其他戰略力量的地位和排序的上升，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中國對於國際秩序以及國際戰略大格局演變的影響力，有助於國際社會其他國家對於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理解。與此同時，雖然美國仍然是國際體系當中強大的國家，但是，由於美國選擇“單邊主義”“美國優先”的價值觀念以及行為方式，把美國一國的國家利益置於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之上，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國際社會大部分國家對於美國行為方式的認同和支持，使得美國的“軟權力”遭到削弱，這些因素將會降低美國在國際戰略大格局當中的影響力。

三、中國與國際戰略大格局的演變

就“中國與國際戰略大格局”問題而言，當前，國際戰略大格局最為顯著的變化就是中美戰略競爭關係的升級與惡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衝擊。2020年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並沒有如同人們想像的那樣使得中美這兩個體系大國從“中美戰略競爭”的狀態當中擺脫出來，轉而藉新冠肺炎疫情之機在戰略合作問題上達成共識。相反，新冠肺炎疫情加劇了“中美戰略競爭”，促使“中美戰略競爭”不斷升級，促使美國不斷對中國進行戰略擠壓，大大惡化了中美關係，為國際秩序和國際戰略大格局的發展和演變帶來影響和衝擊。新冠肺炎疫情與“中美戰略競爭”這兩個因素相互交織、相互作用，共同影響國際戰略大格局的演變。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持續蔓延，特朗普政府不僅持續為自己失敗的抗疫政

策向中國“甩鍋”，更擔心疫情可能成為改變美中力量對比、有利於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機遇”，於是開始了一波接一波的對華打壓和遏制。新冠肺炎疫情成了美國對華實施瘋狂“報復戰略”最突出的國內政治和政策需要。具體而言，特朗普政府的“中國攻勢”從貿易戰、科技戰、媒體戰、人才戰擴大到在南海挑事，甚至圍繞香港問題可能觸發的金融戰。究其原因，美國如此打壓中國，說到底是華盛頓的反華鷹派依仗美國單極霸權的權力優勢，企圖在美國依然保持對華顯著力量領先之際“打疼”中國。這種在人權、自由和規則口號下赤裸裸的權力邏輯還會繼續膨脹。

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使中美關係變壞，而且在繼續變得更壞。隨着中國和平崛起進程的延續，中美實力對比開始出現決定性的變化，中美兩國仍然處於傳統意義上的大國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當中，更準確地說，中美關係仍然處於地緣政治的大國競爭這種傳統範式當中。不論是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印太戰略”，抑或是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都屬地緣政治大國競爭的範式，這對於國際戰略大格局的意義在於，它使得國際戰略大格局成為大國競爭的產物。

新冠肺炎疫情嚴重惡化了美國的對華政策，從而影響和實質性破壞到中美關係原本可以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軌跡，成為大國間戰略競爭深化、對抗升級的重要催化劑。新冠肺炎疫情本身並不是推動國際戰略大格局演變的根本原因，主要大國之間關係的變化才是國際戰略大格局發展和演變的內在機制。更進一步來說，主要大國之間關係的變化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是主要大國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變化，這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國際格局的轉變有可能會促使國際戰略大格局和國際秩序進行調整甚至重建，原因就在於，主要大國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變化之後，主要大國之間的利益安排方式也會隨之進行調整或者變革。二是主要大國之間的“戰略關係”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這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從雙邊關係的層面來看，主要大國之間的“戰略關係”在“戰略競爭”“戰略合作”“戰略對抗”等不同關係模式之間的轉變有可能會導致國際戰略大格局和國際秩序進行調整或者變革；另一方面，從多邊關係的層面來看，主要大國之間的聯盟關係的變化也有可能會引發國際戰略大

格局和國際秩序的變化。

新冠肺炎疫情是促使美國改變對華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因。美國國內政治進程的因素在美國對華政策轉變當中發揮作用，並且具體指出了美國反華鷹派作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推動美國揭開“中美戰略競爭”進程的序幕，進而實施對華打壓和遏制的政策當中所扮演的角色。對於這個問題，筆者在前面的論述當中已經略有提及。筆者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對於中美“戰略關係”的重大變化而言，是作為一種外部條件而存在的，並非根本原因，實際上，國際格局的形勢以及中美兩國各自國內政治進程因素是導致中美兩國進入“戰略競爭”狀態的根本原因。其中，國際格局的單極形式以及美國國內政治進程是現實存在的，並且是正在發揮作用的兩個因素。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宣告了冷戰的結束，與此同時，這也標誌着美蘇兩極格局的終結。在蘇聯解體之後，美國成為國際體系當中唯一的超級大國，就此時美國的實際力量而言，國際體系並不存在能夠與美國相匹敵的國家，美國的實際力量與其他任何大國之間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這種國際力量對比的宏觀背景之下，國際格局明顯呈現出單極的特徵。

在美國主導的單極格局之下，美國擁有“單極霸權的權力優勢”，而美國正是憑藉這種“單極霸權的權力優勢”對中國進行打壓和遏制。

實際上，在冷戰之後，美國外交的主要目標就是維護美國單極霸權。筆者在這裏使用“單極霸權”的提法，原因就在於冷戰結束之後的單極格局與美國的全球性霸權地位之間存在比較特殊的關係，這種特殊關係的主要表現就是：其一，從單極格局的產生過程來看，其是由冷戰時期的美蘇兩極格局演變而來的，蘇聯作為一個超級大國從內部開始解體，這在客觀上導致了美國成為後冷戰時代唯一的超級大國，由此，冷戰時期由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共同主導的兩極格局轉變為美國主導之下的單極格局；其二，從美國霸權地位的發展軌跡來看，冷戰結束之後美國無可匹敵的實際力量賦予了美國巨大的權力優勢：美國擁有巨大的體系性權力，與此同時，美國憑藉其遍佈全球的聯盟關係網絡，在國際戰略大格局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當中佔據支配地位，美國主導了國際戰略大格局和國際秩序的發展進程，從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對其他國家的國際行為